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
CHINA REFORM FORUM

学术研究系列丛书

主编 / 王学军

- ★ 世界政治与经济
- ★ 美国与中美关系
- ★ 亚太地区形势
- ★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 ★ 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
- ★ 台湾岛内局势

郭必坚题



新世纪的思索

XIN SHI JI DE SI KAO

第四卷（下）

研究出版社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学术研究系列丛书

新世纪的思考

第四卷

下册

主 编 王学军

研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世纪的思考. 第4卷/王学军 主编—北京: 研究出版社,
2005.8

ISBN 7-80168-211-4

I. 新... II. 王... III. ①国际政治-文集②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文集 IV. ①D5-53②F1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6375 号

责任编辑 闻 余

责任校对 求 之

封面设计 白 萍

版式设计 石 印

责任印刷 魏艾萍

新世纪的思考. 第4卷

王学军 主编

研究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 1746 信箱 邮编: 100017 电话: 010-63097512)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26.875 字数: 700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0168-211-4

定价 (上、下册): 56 元

本社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以科学的态度认识科学发展观

李君如

一、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涵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论，她和我党提出的任何一种理论一样，是来自实践，是对实践中的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研究认识。

第一，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即经过 20 年努力，建设一个能够惠及 10 多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尤其是经过前 20 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虽然在总体上进入了小康，但仍是低水平、不完全、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社会。比如，到 2000 年进入小康社会时，我们原定的 16 项监测指标和小康临界值有三项没有达到。一是农民的人均收入，指标是人均 1200 元，实际达到 1066 元；二是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指标是人均 75 克，实际达到 73 克；三是建成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指标是 100%，实际上建成 80%。这三项未完成的任务，集中反映了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已经影响到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因此，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如何解决好城乡差别问题，区域发展中的差距问题，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我们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科学发展观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导方针。

第二，2003 年 4 月突如其来发生的非典疫情，虽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并只涉及个别省份，但对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对旅游业、商业服务业、航空业、运输业、建筑业和部分制造业造

成了很大的损失。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降到 6.2%，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社会生活都因疫情而被打乱。疫情的发生和抗击疫情的艰苦努力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在推动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还要搞好公共卫生、教育等各方面工作，要把对人的关爱放在我们工作的重要位置上。因此，在抗击非典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不久，党中央就提出要贯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方针。可见，抗击非典斗争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一个重要的、直接的因素。

第三，2003 年下半年，群众上访事件增多。其中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是城市拆迁和农村大量征地，包括违法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有些地方出现了三无农民：无土地、无就业岗位、无社会保障。这是造成社会动荡的很危险的因素。我们注意到世界上一些国家，在人均 1000 美元到 3000 美元的这个阶段，由于社会需求升级而引发的矛盾特别多。如果处理不好，容易发生各种社会冲突，甚至导致政局动荡。而我们目前正处在这样的阶段。因此，我们自身的状况和国际上的经验都表明，在下一步发展中，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针，要求能够做到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做到可持续发展。这就使我们必须考虑要牢固树立一种科学的发展观，使经济能够发展，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社会能够全面进步。

当然，还有一些事也引起党中央的重视，至少是上面三件事情促使我们对发展问题给予认真的反思。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仅对于为什么要发展加深了认识，而且对于什么叫发展、怎样去发展的问題也深化了认识，我们的理论认识又前进了一大步。

在讨论科学发展观的产生问题时，还需要强调一个问题，即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是完全一致的，不能将这两者割裂开，或者对立起来。现在有些文章认为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发展观是

讲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是主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科学发展观主张共同富裕等等。这样把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对立面来阐述科学发展观，是不正确的，也不符合事实。当年邓小平同志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下决心提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对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贡献。实现这个转移是非常不容易的，此后对这个问题在思想认识上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一直到南方谈话中，他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之后，人们才对这个问题取得了共识。对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是硬道理的观点，以及他的发展理论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任何时候都不能贬低。在这里强调这个问题，就是要认识到，邓小平同志的确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他不是单纯讲经济建设，更不是把经济建设仅仅看成是经济增长。他在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还讲两个文明，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协调发展；强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沿海地区发展起来以后内地也要发展；等等。邓小平同志主张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而抓好经济建设，才有社会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所以，必须明确：邓小平同志的发展理论是我们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这一点上认识不清，就会使我们在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上产生很大的混乱。至于我们工作中发生的一些问题，譬如有些干部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甚至搞弄虚作假；有些地方工作一手硬、一手软，等等，这些都是邓小平同志批评过的，而不是邓小平同志的发展理论所带来的。对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的发展理论的关系必须有正确的认识。

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来自实践的要求，是以邓小平同志的

发展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的。这样的发展观必然切合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对我们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根本指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宏伟任务的提出，标志着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经济上，要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人均 3000 美元，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政治上，社会主义民主要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要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能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各项权益能得到切实保障；文化上，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要明显提高，要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学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可持续发展上，生态环境要不断改善，资源利用效率要明显提高，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等等。显然，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完成这样的任务，就需要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解决好我们所面临的各种矛盾，解决好由我们的基本国情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关于基本国情，邓小平同志说过，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就是说我们是在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然有很大的困难。人口多、耕地少，即我们要解决 13 亿人口（未来二三十年可能增加到 15 亿人口）的生计，而我国的耕地及其他资源都相当短缺。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实现现代化，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碰到过的问题。就耕地而言，我国农村的农民一个劳力的耕地只有几亩，长江以南农民劳均耕地甚至 1 亩都不到。而美国、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农民劳均土地，少者几十亩，一般是几百亩，多者上千亩。我国的耕地奇缺，这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有很大的制约作用。此外，我国的能源、矿产等资源也极为短缺。而在资源短缺的同时，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又是粗放型发展，高消耗，高能耗，低产出。因此，基本国情要求我们

必须深化改革，转换机制，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第二，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的迫切需要。我们是执政党，而且要长期执政。作为执政党，我们今天面临着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要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样两大历史性课题。执政能力，包括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治国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等等。对于我们党来讲，很重要的一种能力，就是要善于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要求和利益关系，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正是我们党在领导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所要求的。

第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也是我们坚持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保证。世界历史证明，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要对旧的国际秩序造成冲击。有些大国的教训告诉我们，通过战争扩张或冷战对抗的形式，来改变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往往遭致失败。我们不能走这样的道路。我们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又进一步作出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决策，在世界市场的公平竞争中，实现双赢、互利，不断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进入21世纪后，我们要在世界上进一步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树立和平与发展的形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走和平崛起的道路并不只是口号，而确实是要解决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在国际上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发展要消耗大量资源，就要从外引进资源。如何做到在中国的发展中，既利用好世界的资源，又能保证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出路无非是两条：一是参与经济全球化，利用世界市场提供的资源，也利用我们国内的资源，以解决我们能源的短缺问题；二是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

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依靠科技进步，降低能耗和资源的消耗，并且对各种资源尽可能节约利用，对世界资源市场的冲击更小一些。中国的和平崛起对我国、对世界都是非常有利的，而树立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走出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四，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归根到底是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非常明确的。同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指出，这种发展是在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统一的基础上的发展。因此，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要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上来实现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它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具体体现，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现代化建设中的贯彻落实。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把宏观的指导性理论变成一个实际中可操作的指针。

三、科学发展观就是强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强调发展，没有发展就无所谓科学发展观。发展观实际是关于发展问题的世界观。人类社会在近代以来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早期的发展观反映了工业革命的要求，强调的是物质生产资料的增长，那个时期把经济发展看作经济增长。到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时候，人们已经看到它的弊端和不足。因为光有经济的增长，并不能完全解决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所以出现了人力资本理论，把人的发展作为发展观的一个中心问题提出来。这是关于发展的一种新认识。后来，罗马俱乐部又提出了全球性的生

态、人口、环境、资源等等问题。尽管它是从悲观论的角度来谈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确实是人类必须注意的。在此基础上，人类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以积极的姿态来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重视经济发展，也不要重视人的发展，而是要把人与自然的协调以及子孙后代的发展都作为发展观的问题来考虑。上个世纪 80 年代还出现了人类发展理论，把整个人类的发展作为一个新概念提出来。可以看出，人们对发展问题有许多研究，这些研究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兴起和现代化的推进，伴随着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过程中各种问题的暴露而逐步加深认识，而逐步形成的一系列发展理论。这些发展理论都是围绕发展的现实而展开的。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更要讲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自己。与此同时，我们又吸取人类文明的成果，认真研究这些发展理论，从我们自己的实际出发，提出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发展问题认识的新成果，也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所以，讲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把发展这个理念确立起来。它不是不发展，而是要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始终是硬道理，经济建设始终是各项工作的中心，这一点必须明确。

第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是要坚持统筹兼顾。统筹兼顾就是要全面地协调各种利益群体、各方面利益关系，使之能达到相对平衡。统筹兼顾是中国的语言，或者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语言，是毛泽东在 1957 年提出来的。在这之前，毛泽东在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就提出了“四面八方”的理论，强调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1956 年提出了“十大关系”，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1957 年 1 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又提出了统筹兼

顾、各得其所的问题。他当时从一个故事讲起。1944年《大公报》在一篇社论中，要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在重庆谈判的时候，毛泽东对大公报的负责人说，你那个话我很赞成，但是蒋委员长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然后话锋一转，毛泽东又说，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包括对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杀的，也要加以改造，给生活出路。1957年2月，他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报告。报告的第七部分就是讲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问题。这里他开宗明义地讲，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6亿人口这一点出发。他还反问道：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6亿人口吗？他说，知道是知道，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因为我们长期搞革命，搞阶级斗争，要分清敌我友，组织一部分阶级反对另一部分阶级。现在我们是执政党了，要搞建设。执政党就要对执政的国家中所有的人负责。这就是统筹兼顾。但是统筹兼顾并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既承认差别，又要使各方面利益都能得到保护和实现，各得其所，是在总体上能够平衡、协调发展。这个方针，由于后来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没能很好贯彻。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才继续坚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江泽民同志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明确提出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这一思想的要求，明确地把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根本要求提出来，而且拓展了统筹兼顾的内容和范围，提出了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所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分析各方面的问题和矛盾，找到协调、平衡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正确的政策。当然，这里面要有一种哲学的认识，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不能把统筹兼顾理解为是绝对的平衡，不能理解为搞平均主义，更不能

重犯过去一平二调的错误。应统筹安排各方面的利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得社会能够协调发展。

第三，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我们讲发展也好，讲统筹兼顾也好，出发点和归宿都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不能为生产而生产，为发展而发展。我们搞好生产、促进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时，我们对人要尊重，要关爱，要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还要维护和保障公民的人权，等等。这些都是“以人为本”。当然，由于我们今天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我们在讲以人为本的时候，作为一种理念，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执政党要时刻确立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要不忘人民群众疾苦，不脱离人民群众，不能做使人民群众痛心的事情；作为一种实践，我们同样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我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和资源少，十几亿人的利益在发展中不可能一下子都得到满足，要分阶段、有层次地逐步使各部分群众利益得到满足，这是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现实途径。人的利益和各方面需求是有层次的。千万不要把群众的胃口吊得很高，结果口惠而实不至；否则，出发点是要取信于民，结果是失信于民。所以，在实践中一定要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具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等各种关系，并且使人民群众也明白这个道理。总之，既要树立全心全意、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的理念，又要在实践中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这样才能正确地坚持以人为本，才能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真正得到贯彻落实。这是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的重要一点。

四、以科学的态度切实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要很好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对科学发展观有一

种科学的态度。我在开始时谈到的如何看待邓小平的发展理论的关系问题，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认识问题。从目前情况来看，我认为还有一些问题应该加以重视。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科学发展观与 GDP 的关系。前一段时间在进行有关科学发展观的宣传中，对 GDP 进行了比较多的评论，包括一些批评的意见。我的看法是，我们能够把 GDP 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指标，应该说是重大的进步。邓小平同志在这上面是有贡献的。过去我们使用“工农业总产值”作为指标，那里面有很多水份。后来我们借鉴世界各国的统计理论及其方法，引进 GDP 以后，比起原来使用“工农业总产值”是进步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同志在提出“三步走”战略的时候，把 GDP 作为每一步的衡量指标，使得我们的发展战略可以量化了，也利于比较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这些年来，我们利用考核 GDP 来推动我们的经济发展，用 GDP 和世界各国作比较，来衡量我们的发展水平。应该说，首先要看到 GDP 的积极意义。其次要看到，GDP 作为统计的手段、统计的工具，和其他任何统计工具一样，是有不足的。这种不足之处世界各国都注意到了。GDP 往往还不能更为准确地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个国家社会进步的实际状况。在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的确想用其他指标来取代 GDP，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在中国，GDP 的不足之处更表现为一些特殊的问题。在中国是按照二元经济结构社会的特点来进行 GDP 统计的。简单地说，改革开放以后，劳动力流动了，但统计的数据是按照不流动居民户口的人数为分母来计算的。譬如，东部地区流入许多劳动力，东部地区的户籍人口加上流动进来的劳动力所创造的产值除以东部地区的户籍人口，是东部地区的人均 GDP，因而数字显得很高。而西部地区流出许多劳动力，把留下来的劳动力所创造的产值除以户籍人口是西部地区的人均 GDP，因而数字显得很低。所以在东西部差别里面有统计方法的问题。可见这种统计是不够科学的。另外，我们有

些领导干部片面强调 GDP，甚至造假、掺水分，人为地造成了统计的不准确。对这些问题我们要注意，但不能由此而否定 GDP，放弃 GDP。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首先需要经济的发展。没有经济的发展怎么能解决教育、卫生、环保等方面的问题，如果没有最基本的物质保障，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是不可能的。所以要看到这里的辩证关系，不能只抓 GDP 而忽略了社会生活其他指标；也不能为了强调科学发展观就把 GDP 批倒批臭，甚至不敢抓 GDP。如果因为只抓 GDP 而没有顾及社会生活的发展是一种弊端，而放弃抓 GDP 要比只抓 GDP 的危害更大。

第二个问题是要科学对待统筹兼顾。统筹兼顾，包括进一步明确提出的五个统筹，应该是总揽全局，全面地考虑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通过协调、平衡达到各得其所，而不是简单地在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富裕人群和贫困人群之间进行平调。我们是吃过一平二调的苦头的，那是另一种不平衡，使生产力遭到瓦解，劳动积极性被破坏。因此我们党提出在分配领域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一次分配中，为了保证效率，要根据人们在经济建设中所作的贡献来分配，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这当中我们的政策要兼顾公平，使差距不要太大。对已经产生的差距，要在二次分配中通过税收等经济的、法律的形式来解决，尽量保持社会公平。这些和一平二调不是一回事。在区域发展的问题上也是一样。西部要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要振兴，中部也要崛起，但不能以牺牲东部的发展来换取。如果没有东部的发展，中、西部的发展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都没有物质条件。所以，统筹兼顾，意味着我们的政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致富的政策，另一方面是扶贫的政策。致富是强调发展，扶贫是为发展创造较好的条件。不要把两方面对立起来，而应该协调发展。作为执政党，我们心中要有困难群众，要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问题，尤其要引导和帮助他们通过发

展而不是通过救济来逐步摆脱贫困。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为本的关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排斥以人为本。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要求扫除各种体制的束缚与弊端，解放生产力，而解放生产力就包括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劳动者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其次，我们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有目的的，就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从动力来讲，来自于人民群众；从目的来讲，为了人民群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为本不但不是相矛盾，后者是更好地体现前者的目的和本质。不要因为提出以人为本，就认为我们原来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种传统的、落后的发展观。我在前面也讲到，坚持以人为本，要看到人们的需求是多层次的，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实现是一个过程，而且是相当长的过程。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工作的同时落实以人为本，而不能离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地、孤立地强调以人为本。这是唯物史观所主张的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所讲的以人为本的区别之所在。

综上所述，我们对科学发展观要有科学的认识，不能同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发展理论对立起来，也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理论，应该在充分认识我国国情和过去发展过程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自己的主心骨，正确把握各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这样，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政治、文化效应，才能够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

（本文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

中国新安全观考

于海波

新时期中国的新安全观，是相对“冷战思维”而言的。^①在2000年中国国防白皮书中，对新安全观的内容解释如下：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变化了的世界需要摒弃冷战思维，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和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只有建立新的安全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从根本上使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得到保障。^②2002年中国国防白皮书强调：当今世界安全威胁呈现多元化、全球化趋势，各国在安全上的共同利益增多。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是当今时代发展的要求。^③具体而言，中国新安全观在安全威胁判断、共同安全基础、安全维护手段和安全

① “冷战思维”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过分强调国家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对立。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同，东西方视对方为敌人，并且努力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强加给别人。第二，“非友即敌”和必须确定一个敌手的观念。冷战时期，由于敌友界限分明，冷战的方视对方为自己的最大“威胁”，以此作为制定对外战略的依据。随着冷战的结束，也就很难判断论证一国安全之最大的“威胁”，因此同冷战时期相比，冷战后敌友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一国安全的威胁来自何方已经成了很不确定的问题。但是西方世界还有不少政治家习惯于从有一个最大的、固定不变的“威胁”这个角度来思考冷战后的国家安全问题，把一个国家视为潜在的假想敌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第三，苏联因素还在影响着一些西方大国的对外政策。第四，过于强调国家的政治与军事安全。参见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0、393页。

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0年中国的国防》。

③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2年中国的国防》。

内涵上，较之以往都更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新安全观之普遍安全论

冷战思维认为国家间实力对比变化和意识形态分歧会产生安全威胁，而新安全观则认为国际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取决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而不是实力差距。各国都应享有安全的平等权利，一国追求安全的政策和行为不能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为代价。“…安全必须是各国的普遍安全。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①

“冷战思维”认为，国家间实力的差距是战争的唯一根源，国家间关系非友即敌；国际关系就是一个二元对立的图景。^②总是认为敌对的方面正在对本国的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构成巨大威胁。把人类历史看成阴谋史，是克服对手、推动文明前进的历史，是不同文明的对抗史。^③这种心态在西方，尤其在美国根深蒂固。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就宣扬，冷战的结束使美国没有了一个明确的敌人，使得政治日益混乱，无法塑造国家认同。“若没有一个邪恶的帝国威胁着美国的立国原则，作一个美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并断言，“中国会成为一个新的敌人。中国的一些重要的集团当然是把美国视为敌人的”，虽然眼下“中国还不会成为足以唤起美国新的国家特性感和目的感的那样一种威胁，但对这种威胁严重性的判断将取决于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对美国利益所造成的损害”^④。

① 江泽民：《推动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9年3月27日，第1版。乔治·凯南：《美国的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01、130页。

② 徐国琦：《美国文化心理情绪与文明冲突论》，载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298页。

③ 理查德·霍福斯坦特：“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风格”，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5，第四页。

④ 塞缪尔·亨廷顿：“国家利益的日渐丧失”，外交，1997年9-10月。